跋文排署——
〈江行初雪圖〉元代奎章閣跋文考

劉嫿嫿

趙幹（活動於十世紀）〈江行初雪圖〉是一件南唐（937-975）遺珍，在有關畫作主題、寓意、風格等方面，學界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。然而，本幅後有一段與元代（1271-1368）奎章閣相關的跋文，迄今尚未引起廣泛關注。這段跋文的內容比較特殊，除進入年月外，其上不見任何與畫作相關的描述文字，僅見十一位備列名銜的奎章閣官員。本文認爲，跋中十一人的聯名，與六朝至隋唐時期宮廷收藏中盛行的跋尾押（排）署制度相關，或是奎章閣在印記制度外，並行的一種書畫收藏及管理方式。

〈江行初雪圖〉，絹本設色，長 376.5 公分，高 25.9 公分，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故宮），從卷本幅上南唐後主李煜（937-978；961-975 在位）所書「江行初雪畫院學生趙幹狀」，可知此卷乃南唐畫院學生趙幹所製，這也是趙幹唯一的傳世之作。圖中，作者用細膩的手法描繪出一番江南初雪之日，漁人在江上辛苦勞作的場景。此卷在岩石、樹枝、山水的畫法體現了五代時期質樸而寫實的特色，是學術界公認的五代山水畫眞跡。[1]（見文末附圖）學界在〈江行初雪圖〉的研究上有著豐富的成果，但這些研究主要集中於本幅畫作，很少見研究者關注跋文。[2] 本文則以此跋爲切入點，旨在對其內容及性質進行討論的同時，試圖探求其製作及使用場合，以窺元代奎章閣收藏及管理制度中的細節。

〈江行初雪圖〉的跋文及問題的提出

天曆二年（1329）春，元文宗圖帖睦爾（1304-1332；1328-1332 在位）在大都創建了奎章閣，初衷是要爲帝王營造一個「陳器玩」、「棲圖書」的休憩之所，收藏及品鑒藝術品因此成爲了其中主要活動之一。[3]

〈江行初雪圖〉是經奎章閣收藏的一件珍貴繪畫，本幅上有奎章閣鑒藏印「天曆之寶」，印文旁有「神品上」三字，疑爲文宗親筆（圖 1），[4]

圖1　五代　趙幹　江行初雪圖　卷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000964

本幅後還有一段跋文，再次提示了此卷與奎章閣間的聯繫。（圖 2）值得提及的是，這段跋文內容頗爲特殊，文中除「天曆二年十一月日進入」外，不見任何與本幅相關的描述文字，只見大段備列名銜的奎章閣官員。安岐（1683-?）《墨緣彙觀》對此詳細著錄：

> 〈江行初雪圖〉後列元季忽都魯都兒迷失、趙世延、撒迪、虞集、朵來、李洞、沙剌班、李納（訥）、雅琥、柯九思、張景先諸臣銜位，後書天曆二年十一月日進入，以上名銜自左起往右排書……[5]

以上可知，這段跋文共記載了十一位奎章閣大臣，不僅具名總數多，且具名的官員皆爲閣中核心成員（正六品以上中高層官員十人），由此可見此畫在當時的重要性。需要指出的是，題名的順序是按照官品由低（張景先）至高（忽都魯都兒迷失）的順序，從右至左、由先至後依次書寫，此外，與一般書畫跋文中先寫名款、後書年月的方式很不一樣，此跋日期是寫在名銜之前的，以上兩點也是安岐在著錄中所指出的。

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來看，此跋皆以小楷完成，雖書寫較爲工整，但仔細觀察，用筆孱弱、結體鬆散，字畫間佈置又無章法可言，其書法與此時虞集（1272-1348）、柯九思（1290-1343）、歐陽玄（1283-1357）、揭傒斯（1274-1344）等奎章閣名家比較可謂相差甚遠，由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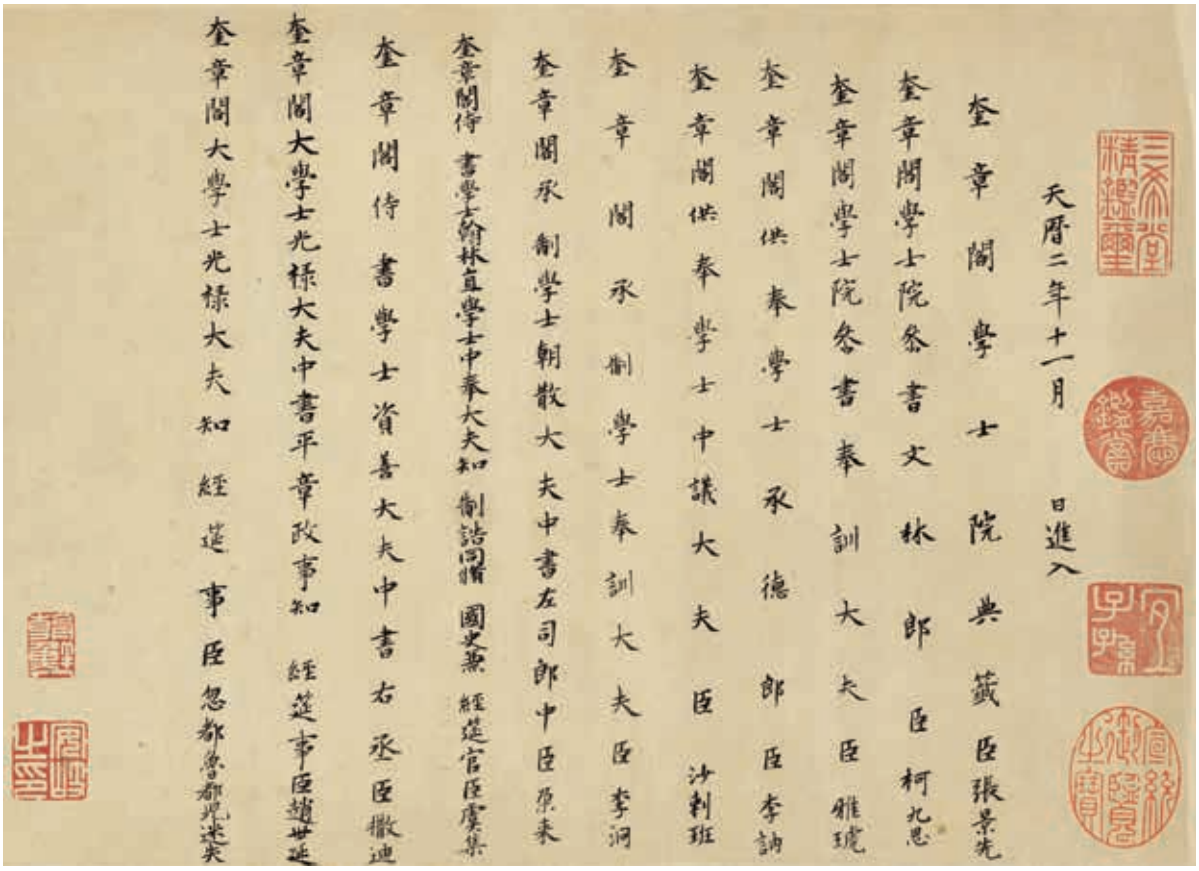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　五代　趙幹　江行初雪圖　卷　局部　元人跋文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000964

可見，此跋並非閣中名家所作。此外，在跋文「天曆二年十一月日進入」中，「月」與「日」二字之間有約二至三字符的留白（圖 3），可見是某種原因而導致的漏填，然這種現象在古代公文書中也時有所見，如古代在任命官員時頒發的憑證「告身」中，故宮藏唐〈朱巨川告身〉卷及宋〈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〉卷即是例子。（圖 4 ～ 6）究其緣由，則因告身皆由文書製作人提前寫好，而起草、審批與發行是公文書作業中幾個獨立的環節，這便令書寫人在起草之際面臨了審批及行下時日不確定之問題。〈江行初雪圖〉跋中日子留白的現象，與告身中所見頗爲相似，這提示出此跋或與書寫者提前書就有些許關聯。

還需說明的是，即使在上述幾件告身作品中存在不填日期的現象，但其空白處多見官印的鈐蓋（見圖 4 ～ 6），可相比之下，〈江行初雪圖〉跋中除清梁清標（1620-1691）、安岐、清乾隆帝（1711-1799；1735-1795 在位）、宣統帝（1906-1967；1908-1912、1917 在位）等印外，不見任何與奎章閣相關的用印，不知是否原本即如此，亦或是該跋乃原文的副本或抄寫本，或後世的臨摹本，但由於缺乏更多可供比較的作品，其版本問題尚待日後進一步考證。然則，即便此卷爲抄寫本或後世臨摹本，但文中官員的官職與史料中記載一致並相互補充，內容本身眞實可信，因此，對研究奎章閣的收藏具有一定價值。

從跋文「天曆二年十一月日進入」，可知此卷乃進入之作，雖未書具體日期，但其中一位大臣撒迪此時爲「奎章閣侍書學士資善大夫中書右丞」，《元史》載天曆二年十一月己巳（十七日）授「撒迪爲中書省右丞」，[6] 進而推測〈江行初雪圖〉的進入時間是在天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之後。由於此卷是進入之作，跋中又見大臣之聯名，因此學者們多將此卷看作爲聯名（具名）進呈之作。[7] 官員進呈是奎章閣收藏來源的一個方面，如柯九思曾進晉代〈曹娥耒辭卷〉、張金界奴（1296-?）進唐代虞世南（558-638）摹〈蘭亭序〉等，但這類進呈基本上都是官員以個人名義的進獻，很少見聯名進呈之藏品。這不禁令人懷疑，跋中官員的聯名是否與實際進入有著直接的關聯，如若二者間關聯薄弱，跋中聯名又代表什麼？以上正是本文所關注的重點。

奎章閣中的收藏及管理制度

上文指出了〈江行初雪圖〉元人跋中的聯名特徵，實際上，在奎章閣，書畫後的聯名現象不止此一例。永瑆（1752-1823）《詒晉齋集》曾記「黃荃〈柳塘聚禽圖〉後，有『臣張金界奴上進』及諸臣官名，楷字極細」。[8] 張金界奴曾供職於奎章閣，[9] 並向文宗進呈多張書畫，[10] 而〈柳塘聚禽圖〉後的「諸臣官名，楷字極細」又與〈江行初雪圖〉跋文的特點頗爲相似。

值得說明的是，書畫後聯名的形式並非元代所創，而有悠久的歷史，最早可追溯至六朝，而這種傳統又在隋、唐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，時稱「跋尾押署」或「跋尾排署」。唐貞觀年間（627-649），太宗（598-649；626-649 在位）大購圖書並寶於內庫，將收藏來的鐘繇（151-230）、王羲之（303-361）等書法「裝成部帙，以『貞觀』字印印縫，命起居郎臣褚遂良排署如後」，[11] 而開元年間（713-741），玄宗（685-762；712-756 在位）「購求天下圖書，亦命當時鑒識人押署跋尾」。[12] 唐代張彥遠（815-907）《歷代名畫記．敘自古跋文押署》對此有現象有所記載，其言：「前代御府至晉宋至周隋收聚圖畫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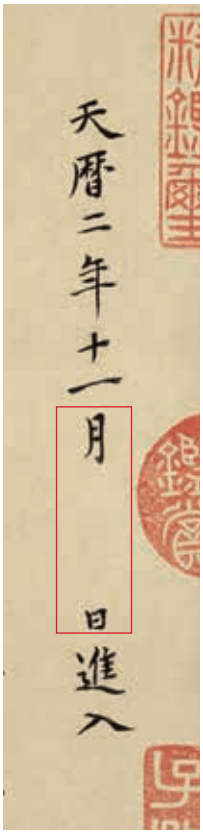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　江行初雪圖　元人跋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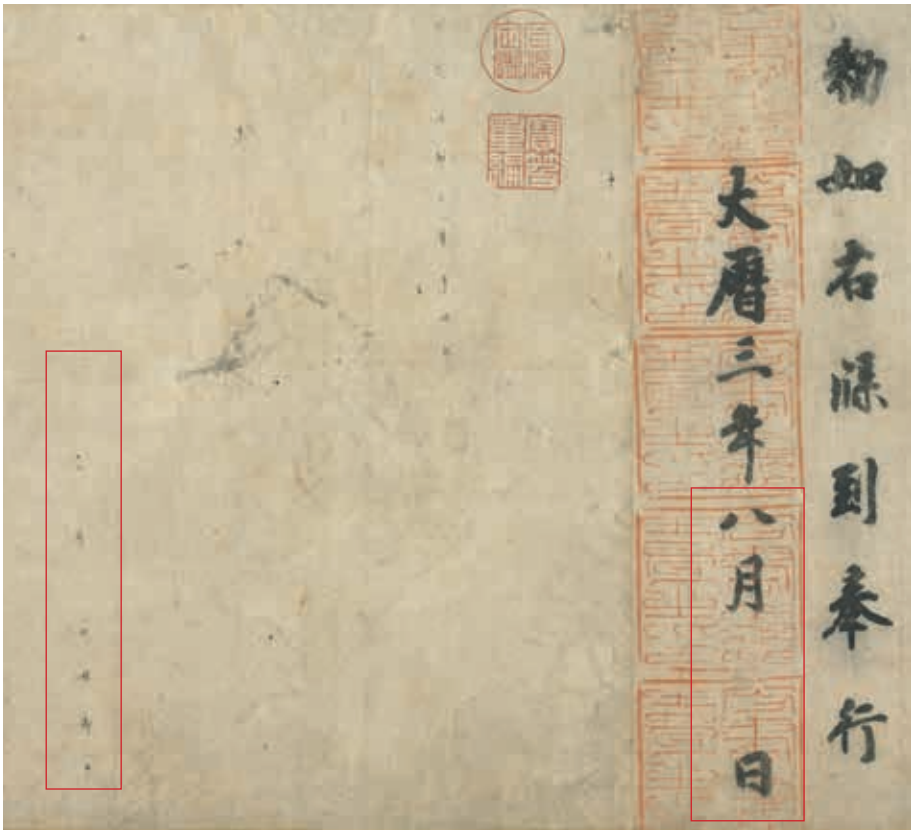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　唐代　（傳）徐浩　朱巨川告身　卷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書00006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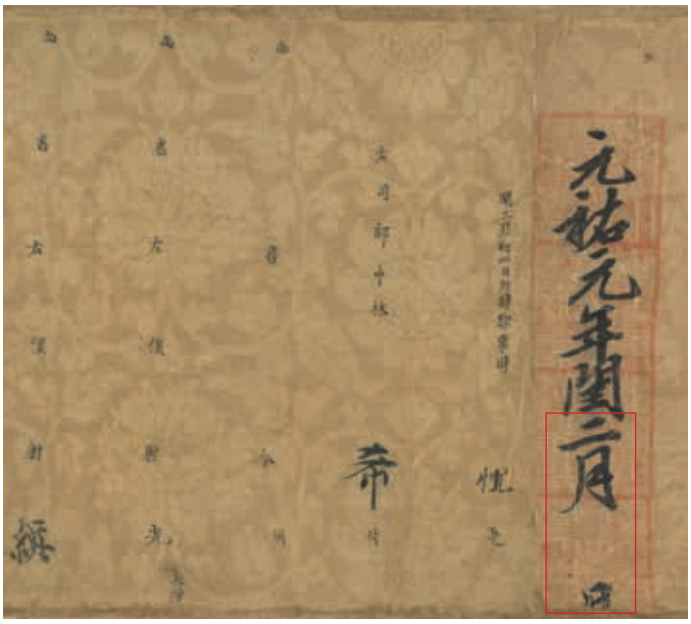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　宋代　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　卷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書00007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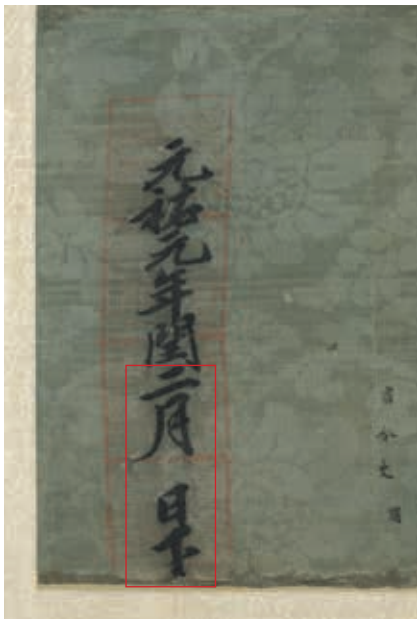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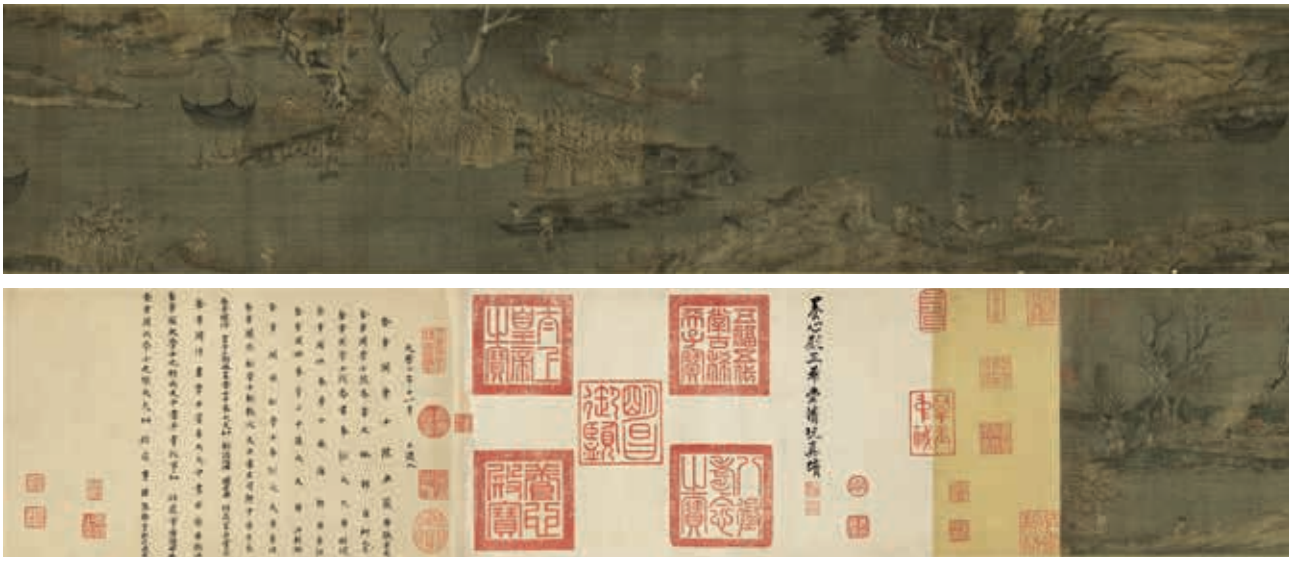
圖6　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　卷　局部

皆未行印記，但備列當時鑑識藝人押署」，[13]可知跋尾押（排）署的方式與宮廷書畫鑒藏制度緊密相連，在唐代印記制度出現之前，是宮廷收藏、鑑定及管理書畫的主要方式，且押（排）署的方式關乎書畫的收藏、鑑識與裝裱，給予藏品權威的認定意見。

不僅如此，張彥遠在《歷代名畫記》中還詳細記載了由劉宋至唐時，多件有跋尾排署的作品，而其中開皇年間（581-600）的記載又與故宮藏王羲之〈平安何如奉橘三帖〉的跋文相映證。圖像中，我們可以看到簽署是位於本幅作品後，且其形式是先書年月、再書鑑識人官銜及姓名（圖7），張彥遠將此總結爲「押署、跋尾、官爵、姓名」四特點。[14]

對於六朝、隋唐時期盛行的跋尾押（排）署制，劉濤認爲這是移用了前代「署紙尾」之制，[15]而此後貞觀年間，書畫藏品的管理開始實行並流行印記制度。筆者十分認同這個觀點，並且認爲書畫中的押（排）署與公文書中的通簽頗爲相似，尤其是「告身」中的「通簽書」部分。告身通常由兩個部分四項內容組成：第一部分爲敕命告詞部分，包括草擬的告詞，以及有關部門審批後官員的「通簽書」；第二部分爲「告」文，包括尚書省以「符」的形式下

圖7　晉　（傳）王羲之　平安何如奉橘三帖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書000050



附圖　五代　趙幹　江行初雪圖　卷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000964

發告書，以及受告吏和主管制作官告官員的簽書。[16] 所謂「通簽書」，是告身在起草後由相關部門審批時的簽字，以制授及敕授告身的頒發爲例，在無特殊情況下，皆需經過中書、門下、尚書三省運作，並由各省官員列銜簽署，以表示對公文內容共同負責。[17] 值得提及的是，上文所述幾卷流傳於世的唐宋告身中，通簽部分的書法與文書主體稍有不同，王競雄稱其爲「細銜」，[18] 皆由書吏以規整的細楷提前書就，且每位官員的名銜佔據一行，依次排列。（見圖 5）這種書寫方式不僅與〈平安何如奉橘三帖〉後官員排署類似，也與〈江行初雪圖〉跋文的書寫頗爲相似。

綜上所述，自晉代至隋唐，宮廷書畫收藏流行的跋尾押（排）署，與本文所討論的元代奎章閣跋文中的聯名十分相似，或爲〈江行初雪圖〉跋中奎章閣聯名方式的淵源，呈現出奎章閣收藏制度中的細節：這是奎章閣在「奎章閣寶」、「天曆之寶」等印記制度外，並行的一種書畫收藏及管理的方式。

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博士候選人

註釋：

1. 參見江兆申，〈從畫家構圖意念來看中國山水畫的舊有進展〉，《雙谿讀畫隨筆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77），頁 103；徐邦達，《古書畫過眼要錄．8．晉隋唐五代宋繪畫》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14），頁 54。
2. 目前對於該跋文的討論，僅見學者在論述蒙元皇室收藏中稍有提及，參見陳韻如，〈蒙元皇室的書畫藝術風尚與收藏〉，收入石守謙、葛婉章編，《大汗的世紀：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1），頁 280。
3. 奎章閣的建立目的見（元）虞集，《道園學古錄》，收入王雲五主編，《萬有文庫第二集七百種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，據民國整理本影印），卷 22，〈奎章閣記〉，頁 373-374。

4. 張珩，《木雁齋書畫鑑賞筆記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4），冊 1，頁 56；傅申，《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1），頁 53-54。
5. （清）安岐，《墨緣彙觀》，收入盧輔聖主編，《中國書畫全集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96，據清宣統刻本影印），冊 10，卷 3，頁 369。
6. （明）宋濂等編，《元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6，以百衲本為據，校以北京圖書館藏原書、北京大學藏一百四十四卷卷殘洪武本及北京圖書館藏南監本），卷 32，頁 744。
7. 宗典編纂，《柯九思史料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85），〈奎章閣聯名進入〈趙幹江行初雪圖〉〉條，頁 20；陳韻如，〈蒙元皇室的書畫藝術風尚與收藏〉，頁 280。
8. （清）永瑆，《詒晉齋集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，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影印），冊 1487，卷 8，〈記所見書畫〉，頁 211。
9. 陳旅〈群玉內司華直題名記〉言：「上且思所以覆幬之，俾留守張金界努作直舍于閣之旁。」可知張金界努曾在奎章閣為官。（元）陳旅，《安雅堂集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珍本二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1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冊 398，卷 7，〈群玉內司華直題名記〉，頁 2b。
10. 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〈盧世南行書摹蘭亭序卷〉，其上有「臣張金界奴上進」；又見《清河書畫舫》記載唐尉遲乙僧〈天王像卷〉，上有「臣張金界奴上進」及「天曆之寶」。（明）張丑，《清河書畫舫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，以池北草堂本為據，校以四庫全書本），卷 3，〈尉遲乙僧〉，頁 105。
11. （宋）陳思，《書苑菁華》（上海：掃葉山房，1919，浙江汪汝瑮家藏本），冊 4，卷 13，〈唐徐浩古蹟記〉，頁 11a。
12. （唐）張彥遠著，《歷代名畫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，據津逮秘書本影印），卷 3，頁 97。
13. （唐）張彥遠著，《歷代名畫記》，卷 3，頁 91。
14. （唐）張彥遠著，《歷代名畫記》，卷 3，頁 94。
15. 劉濤，〈押署、跋尾與印記〉，《讀書》，2021 年 11 期，頁 101。
16. 龔延明，《宋代官制辭典（增補版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），頁 692。
17. 白化文、倪平，〈唐代的告身〉，《文物》，1977 年 11 期，頁 80；王競雄，〈〈書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〉研究〉，《中國書法》，2008 年 1 月，頁 89-90；簡松村，〈唐代的告身──簡介院藏朱巨川告身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13 期（1984.4），頁 116。
18. 王競雄，〈〈書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〉研究〉，頁 89-90。